

● 语义哲学

# 语言符号、意义和经验知识

朱 志 方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志方(1961-),男,湖北仙桃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分析哲学研究。

[摘 要] 关于语言符号的意义的陈述是经验陈述的一个种类,而不是一个分析陈述。语言符号的含义和指称与我们获得经验知识的方式相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符号学的循环。由意义陈述的经验性和指称与含义的相互依赖性导出摹状词理论和因果理论的相容性。

[关键词] 意义;经验知识;符号学循环

[中图分类号] B0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517-06

语言符号主要是词语和从词语构造出来的语句,不同于信号、手势语等符号。在分析哲学传统中,一个词的意义被分为涵义和指称。本文讨论现行的意义理论所遇到的困难和指称与涵义的关系。本文参照经验知识理论构建了一个新思路。讨论的焦点是单称词和通名词的意义。

## 一、意义难题

按照分析哲学传统的意义理论,一个词语的意义主要是由它的涵义和指称构成的,不论它是一个单称词还是一个通名词。G·弗雷格证明,穆勒的意义理论(专名没有涵义,只有指称)是错误的<sup>[1]</sup>(P.92)。考虑以下语句:

晨星是暮星。(1)

晨星是晨星。(2)

(1)有经验知识,而(2)是一个重言式。这个区别表明,所有的指称性词语,包括专名,都既有指称也有涵义。

如果一个词语既有指称也有涵义,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分析哲学的意义理论隐含着这样的观点:一个词语的指称是由它的涵义决定的。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词语的涵义是什么?照通常的说法,一个词语的涵义是由定义给出的。以“亚里士多德”和“老虎”为例,它们的定义是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哲学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山大大帝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3)

老虎是一种大型的猫科食肉四足动物,黄褐色,有黑色横纹,腹部为白色。(4)

说一个词语的指称由它的涵义决定,就等于说,它的指称是具有定义所说的那些性质的对象或事物。由此可以推断,任何一个哲学家,只要曾在柏拉图门下求学、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写了《形而上学》,他就是亚里士多德;任何一种动物,只要具有(4)所描述的性质,就是老虎。

这种意义理论叫做摹状词的意义理论,它的立场是:一个词语的涵义是由定义右边的一个或一组摹状词提供的,具有摹状词所描述的性质的事物就是该词语的指称。具体地说,一个专名的涵义是由一个

或一些限定摹状词提供的,如(3),而一个通名词的涵义是由一个或一些不定摹状词提供的,如(4)。

然而,摹状词理论受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批评,因此从根本上被抛弃了。除了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批评之外,M.戴维特和K.斯迪莱尼将摹状词理论所遇到的困难总结如下<sup>[2]</sup>(P. 41—42):

(a)人们常常把许多限定摹状词同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对待“亚里士多德”的,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限定摹状词之外,我们还将“三段论逻辑的集大成者”、“《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作者”等等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限定摹状词中哪一个或哪一些提供这个名字的涵义呢?其中哪一个限定摹状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它没有指称,即使其他摹状词都有指称,这个名字也是空的?说其中一个摹状词如此重要,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b)假定有一个限定摹状词对于这个名字的一个使用者有如此的重要性。同一个摹状词似乎不大可能对于另一些使用者也同样重要。因此,名字“亚里士多德”虽然用来指称那个古希腊的大哲学家,其涵义却是因人而异的。

(c)如果一个名字的涵义等同于一个限定摹状词的涵义,那么,语句

亚里士多德教过亚历山大大帝。(5)

就是没有内容的或先天地真的;而语句

亚里士多德没有教过亚历山大大帝。(6)

就是自相矛盾的。

像摹状词理论的某些倡导者那样,求助于一组摹状词,并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是使事情更加复杂。这些批评经过扩展,也适用于关于通名词的摹状词理论。

对摹状词理论更严厉的批评来自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克里普克试图说明,对于一个词语指称它的对象,摹状词提供的识别性知识既不是充分的,也不同必要的。普特南和克里普克提出了因果意义理论来取代摹状词理论,认为因果理论更有说服力。

按照因果理论,名字是固定记号,这就是说,一个名字在所有可能世界指称同一个对象。通过命名过程,一个名字同一个对象的联系被锁定,这个过程是它的定基。以后,在一个相应的交流共同体的交流中,那个名字就被用来指称那个对象,这样一个指称链(d-链)就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涵义和指称是由命名过程和d-链确定的。通名词也适合于这幅意义图画。

因果意义理论真的滴水不漏吗?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理由否定这个完全排除摹状词的作用的纯因果理论。

(a)不借助于摹状词,因果链或d-链就无法延续。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一个男婴出生了,他的父母为他取名“亚里士多德”,许多亲戚、朋友出席了命名仪式,此后他就叫做亚里士多德,一个d-链就开始了。但是,只要他独自待一会儿,d-链就中断了。换句话说,d-链是由那个男婴的性质的相似性来支撑的,如他的脸相,他的衣着,他的位置等等,而这些正好是摹状词所描述的。不求助于摹状词,就会有许许多多多次重命名、重新定基,一个名字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它的涵义和指称。

(b)对于通名词,因果理论所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除了重复辩认之外,还有一个事物是否属于相应的类这个问题。任何命名,不论是专家还是相关的个人做出的,不管命名者多么可靠,命名的定基总是只涉及一般种类的一个样本,如“老虎”一词。人们根据什么用“老虎”一词指称过去和现在存在于命名样本之外的老虎和将来会存在的老虎?借助于摹状词,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不幸的是,这里所需要的摹状词已经事先被排除了。

有些学者建议将因果理论和摹状词理论结合起来,并相信这是解决意义问题的正确思路。但是,如果承认意义语句的分析性,任何新方案都会面临意义语句的分析性问题提出的挑战。

按照公认的观点,一个词语的意义是由它的定义提供的,而一个定义只不过告诉我们那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当引入一个新词时,一般是采取这种方式。一个词语的意义仅仅通过语言学习就可以了解,因

此,陈述一个词语的涵义或它的定义的语句是分析的,必然真的,先天地知道的。哲学家喜爱的例子是单身汉是未婚男人。(7)

与(7)相平行,(3)和(4)也都是定义,它们为那些不知道这两个词的意义的人解释这个词的意义。从以上假定可以推出,语句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8)

是分析的,与世界上的事实无关。这个推断显然是不可信的。

## 二、意义和经验知识

我们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8)是一个经验事实或经验知识陈述,而不是一个重言式,因为他描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什么。我关于意义问题的核心思路是,意义语句,如(3)、(4)、(7),是经验知识陈述的一个特殊种类。

语言学家把需要解释的词语的意义还原为其他词语,他假定听话者已经理解了“其他词语”。但“其他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语言学家没有提供答案。对于语言学家,存在一些初始词语,新词语的意义是用初始词语来解释的。初始词语的意义是已知的,无需解释。从这种观点看,语言学与世界和经验研究无关。然而,一个基本的符号理论,不论是叫做符号学还是叫做语言哲学,必须提供一些解释初始词和非初始词的可靠方式。现在,我们考虑意义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哲学的初学者问:“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即要求对“亚里士多德”一词做出解释,他提出的是关于那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事物或人的问题。任何对“什么是亚里士多德”这个问题的回答都必须是关于那个实际的个人的经验陈述。同样,任何对“什么是老虎”这一问题的回答都必须是关于那种真实的动物的经验陈述。无需说,任何关于亚里士多德或老虎的陈述都必须用符号或词语来表达,但这并不等于一串同义词。它是用词语所做的经验陈述,而不是纯粹的词语解释。

意义语句是经验陈述这一假定意味着,意义语句具有经验知识的一切性质:可误性、可改性和进步性。我相信,以这个假定为基础,对摹状词理论的全部批评都可以消除,因而摹状词理论可以重新树立。

我关于意义语句的经验性的方案将会表明,它具有许多可喜的特点。这里对其中一部分做一个概述。

(a)指称失败对于一个意义理论来说不再是生死攸关的。当一个摹状词被当做一个词语的涵义提出来时,这个摹状词可能不适合或不一定适合该词语指称的对象。“鱼”就是一个例子。“鱼”的常识描述也许是:

鱼是生活在水中并能游水的可见的生物。(9)

(9)中的摹状词的指称可以包括鲸。汉字“鲸”的偏旁的意思就是鱼。此外,我们中国人习惯于说“鲸鱼”,将鲸和鱼联系在一起,尽管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生物学家已确定鲸是一种哺乳动物,而不是鱼。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设想,新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形而上学》不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写的。在这种情况下,“《形而上学》的作者”就不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些指称失败对于一个意义论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意义语句作为一个经验陈述是经验上可误的。意义语句的可误性导致我的方案的第二个推断。

(b)与经验知识一样,意义语句是可修改的,因此是可改进的。以新证据为依据,一个意义语句可以修改,从而更加适合相应的对象。如果关于“亚里士多德”或“鱼”的意义语句被经验证据所证伪,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更恰当的定义。基于经验知识的特性,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c)摹状词理论得到拯救,成为一个可接纳的意义理论,因为前面提到的三个困难都可以借助于经验性概念来消除。首先,关于选择一个或一组摹状词作为一个词语的意义的的问题,回答是,这种选择依赖于相应的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活动的描述在哲学的学习者中是更重要



的。哪些性质对于确定某个事物是不是鱼起关键作用,一般是由生物学家来决定的。第二,在我的意义构想中,意义对于不同的使用者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是可以允许的。如果词语的使用者之间发生严重的分歧,经验证据将做出判决。第三,由于具有经验性,意义陈述不是必然地真或必然地假;如果是真的,也不是一个重言式,如果是假的,那也不是自相矛盾的。

以经验证据为根据,意义语句可以修改、可以抛弃、可以改进,这一方案需要采取一种关于涵义与指称的关系的新观点。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需要修正。这里的深层想法是,经验证据要在对象方面去寻找。当一个定义需要修改时,这预设了我们已经先确定了相关词语的指称,因此修改是以事先确立的指称为基础的。这表明指称和涵义是相互依赖的。我提议把这种相互依赖性叫做“符号学循环”,与解释学循环相平行。当我们有了一个词语的涵义时,我们可以用涵义来决定它的指称,许多科学发现是以这种方式做出的;当我们确定了一个词语的指称时,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个或那些对象,看看新的发现是否会迫使我们改正我们的意义语句;另有许多科学发现属于第二种类型。

(d)我的方案意味着,把绝对确定的指称和意义语句的分析性搁在一边,摹状词理论和因果理论就是相容的和互补的。与摹状词理论相结合,因果理论就能够很好地说明涵义和指称的相互依赖。在命名过程中,一个或一类对象与一个词语联系起来,该词语以被命名对象的摹状词为它的涵义。对象可能改变其性质,例如,亚里士多德长大成人,关于他的知识也随之增多和加深,指称该对象的词语的涵义也随之得到丰富和改变,相应的 d-链也跟着越来越长。在这个过程中,摹状词充当着因果链条的环节。当新发现使一个新摹状词出现时,d-链也就获得了一个新环节;而当一个摹状词被证伪时,这条 d-链就得重新连接。

### 三、评摹状词理论所受到的批评

要拯救摹状词理论,就要对它所受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以下概述一些最重要的批评和反批评。

#### (a)充分性

克里普克力图说明,说话者把有关一个对象的识别性知识(即专门的摹状词)同一个名字联系起来,对于那个名字指称那个对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因此,理解一个名字,即能够恰当地使用它,不在于拥有这样的知识或知道惟一适用于被指称对象的摹状词。

首先以“西塞罗”为例考虑必要性问题。许多人听说过西塞罗并用这个名字指称他。克里普克假定,我们关于西塞罗的惟一的知識是“西塞罗是塔利和指控喀提林的人”,这穷尽了我們关于西塞罗的知識。在克里普克看来,以上摹状词不适用于用来识别西塞罗,因为它也含有名字。而关于摹状词所包含的名字,我们除了“塔利是西塞罗”和“喀提林是被西塞罗指控的人”之外,别的一无所知。循环是很显然的。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惟一的摹状词并不构成关于西塞罗的识别性知识。但是,在这个事例中,我们仍然用“西塞罗”指称西塞罗。于是,克里普克得出结论,识别性知识对于成功的指称是不必要的。

我认为,在这个事例中,克里普克的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从中得出的推断可以相反:如果我们只知道西塞罗是塔利和喀提林的指控者,别的一无所知,如果别人都不可能知道更多,那么这么一点点知识不足以使我们用“西塞罗”指称西塞罗,因此“西塞罗”几乎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正是由于另外有一些人(如历史学家)知道那个与西塞罗有关的时代的历史,因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所以一个对西塞罗知之甚少的人才能用“西塞罗”指称他。名字“西塞罗”要在他所处的时代的复杂历史背景下来解释,没有这些历史知识,这个名字就完全失去了指称和涵义。

另一个否定识别性的摹状词的必要性的论证是错误问题。例如,许多人相信爱因斯坦是原子弹的发明者。虽然有这个错误,他们还是用“爱因斯坦”指称爱因斯坦,而不指称别人,不指称奥本海默。如果完全无知,人们能够用“爱因斯坦”指称爱因斯坦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爱因斯坦”可以独立于“原子弹的发明者”这一短语来识别,所以很多人尽管相信爱因斯坦是

原子弹的发明者，却能够用“爱因斯坦”来指称爱因斯坦。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相信爱因斯坦是原子弹的发明者，而且关于爱因斯坦人们不可能知道更多的东西，那么“爱因斯坦”的涵义和指称就不同于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实际具有涵义和指称。而且，“错误”这一概念本身就预设了正确，因此预设了识别性的知识或摹状词。正是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真理为根据，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说爱因斯坦是原子弹的发明者这个信念是一个错误。如果每个人都对爱因斯坦一无所知，我们根据什么断定，当许多人相信爱因斯坦是原子弹的发明者时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呢？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对《圣经》中的约拿故事的克里普克式的玄想：如果没有历史证据表明约拿实际上存在，那么“约拿”是一个空名；如果有证据表明约拿是实际存在的而又没有做《圣经》所说的那些事情，那么《圣经》中的约拿故事就是假的，这种假与经验陈述的假没有什么两样。

我想，从以上讨论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一个名字指称一个对象，识别性知识是必要的。

#### (b) 充分性

设想有人向听众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虚构或一个梦，但听故事的人相信他讲的是真事。那个故事说有个叫彼得拉拉的人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再设想在现实世界中有个叫巴勃的人，讲故事的人并不认识他，而他却恰好做了故事里所说的那些事情。名字“彼得拉拉”指称巴勃吗？克里普克的回答会是否定的。于是，对于克里普克，虽然讲故事的人具有关于巴勃的识别性知识，但他并不用“彼得拉拉”来指称巴勃，因此，那些摹状词对于“彼得拉拉”指称巴勃是不充分的。

这个反对识别性知识对于一个名字指称一个对象的充分性的论证可以这样来反驳。首先，讲故事的人不知道巴勃，这一事实表明，他所讲的故事中的摹状词不可能是关于巴勃的识别性知识。其次，如果他讲的故事完全适合巴勃而且他讲完故事后不久就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是虚构，那么别人可能用“彼得拉拉”来指称巴勃，这样，“彼得拉拉”的指称就变化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关于那位讲故事者的故事：他写了一部关于某个虚构人物的传记，他写完他的著作后不久就去世了，所有读者都相信那部传记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即巴勃，而他把那个人叫做“彼得拉拉”。在这种想象的情况下，“彼得拉拉”就指称巴勃，他的识别性知识对于他用“彼得拉拉”来指称巴勃是充分的。第三，我们关于讲故事者的故事只是一种想象。实际上，如果他对巴勃一无所知，他的故事不大可能完全适合于巴勃。虚构的彼得拉拉与真实的巴勃之间一定有某些差别，这些差别是两个名字具有不同意义的关键，而且是可以经过经验研究来查证的。由于经验知识可以改进、扩大、加深，识别性知识也将随之而改变。识别性知识如果真正是识别性的，那么它对于一个名字指称相应的对象就是充分的。

#### (c) 普特南的同质人

普特南构想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学幻想故事来反驳关于名字或词语意义的摹状词理论。他想象在宇宙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与我们的地球非常相似的同质地球。每一个地球人都有一个同质地球上的同质人，他与那个地球人在每一个原子上都是一样的。两个行星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一对应的，包括国家、语言和事件。设想彼得陈述了他的投票意图：“我将投布什的票，因为我们需要布什来发展美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同质彼得也说了同样的话。两个彼得用同一个“布什”指称不同的人。在普特南看来，每一个关于布什的摹状词都适用于两个布什，但两个彼得用“布什”指称的都只是一个布什！

普特南想要借助于同质地球的虚构来说明，指称和意义不仅仅依赖于相关的摹状词，指称只能由因果链来确定。他相信，这个论证可以推广到“水”、“狗”等通名词上。

普特南的虚构故事很有想象力，但他的论证并无说服力。当然，宇宙中可能有两个或多个事物彼此极其相似，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然而，没有两个事物在每一点上都完全相似这一形而上学的假定是牢固地树立的。如果两个事物极为相似，那么就需要做更大的努力去辨别它们，这就是说，需要做极大的努力去寻找把它们区分开来的识别性的摹状词。但是，不论这件事情是多么困难，识别性的摹状词不是不可能找到的。

对于普特南的虚构，识别性摹状词是不难提供的：“地球人布什”与“同质人布什”就可以把他们区别

开来,即使两个布什在每一个原子上都相似。如果这颗行星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即每个地球人都完全不知道那些同质人的存在,反之亦然,那么,普特南的虚构对于意义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论在地球上还是在同质地球上,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或受这样的问题困扰。如果两颗行星之间有某种交流联系,甚至有“太空旅行航线”,那么识别性知识仍然是可能的,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人工记号来进行区分。我们的经验知识是进步的。即使一个地球物体和一个同质地球物体在每一个原子上都相似,我们仍然有可能在亚原子的层次上区分它们。

总之,经验知识将会为我们提供指导,我们不必担心。

### [参 考 文 献]

- [1] I.M.Copi, A. Gould. Contemporary Readings 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 [2] Michael Devitt, Kim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 [3] Saul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4] Hilary Putna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责任编辑 严 真)

## Linguistic Signs, Meaning & Empirical Knowledge

ZHU Zhi-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U Zhi-fang (1961-), Doctor,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bstrac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eaning sentence, which states the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sign, is not analytical as is assumed by philosophers of language or semioticians in 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but a special kind of empirical statement of knowledge. With the suggestion, description theory of meaning is transvalued, and causal theory of meaning is shown to be implausible without appeal to descriptions. Furthermore, a notion of semiotic circle is coi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ense and reference of a term is interdependent, which entails the compatibility of description theory with causal theory.

**Key words:** meaning; empirical knowledge; semiotic circle